



王燕玉 著



紫巢文存一  
ZICHIAOWENCUN

一处己能讓，凡名譽、地位、利益，與人相涉，退避不爭。二处人无忌，于他人多思优长，隐其短失，口颂笔赞。三处事不苟，凭劳动以换生活，任事负责，治学严谨。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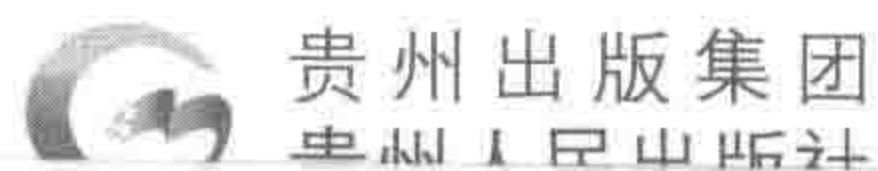
# || 紫巢文存 ||

一

王燕玉 / 著

王任索 / 编辑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编



## 编辑委员会

主任 顾久

副主任 王德玉 沈志明 杨玉和

靖晓莉 杨庆武

委员 翁家烈 张新民 张润生

李立朴 王任索 王尧礼

## 编辑部

主任 王尧礼

副主任 陈丹阳

编辑 王尧礼 陈丹阳 胡海琴

张彪 郎启飞 汤苏婷

# 总 序

顾 久

《贵州文化老人丛书》就要出版了，我有责任来交代一下缘起。

“尊贤尚德，敬老崇文”，是文史馆的宗旨，整理出版馆员、特聘研究员著作，是这一宗旨的体现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馆里陆续资助出版了十来种馆员、特聘研究员的文集，因为经费支绌，只能内部印行，影响受到很大限制。庚寅之夏，时任贵州省人民政府省长的赵克志同志来馆视察，馆中提出了一个编辑出版贵州文化老人丛书的构想，赵克志同志当场批准，并指示随同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办理经费划拨事项。困扰我们的根本问题一朝纾解，文史馆随即组成了编委会，对书稿进行遴选，编委会下设编辑部，负责具体编务，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贵州文化老人”一语，起于刘学洙先生对陈福桐先生的称谓，实则当得起这个称号的人不止陈先生一个，所有年高德劭、学养深厚的先生们皆是。如此则外延有所扩大，非我馆馆员、特聘研究员也在其中。所以丛书的作者以馆员、特聘研究员为主，兼顾其他。丛书内容也很宽阔，涉及了文史哲及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形式更是多种多样，诗文、论著、书画皆有，看似庞杂，却有一个主旋律——贵州。

朱子解释“文献”一词说：“文，典籍也；献，贤也。”贤，就是熟悉典章制度、见闻广博、年高德劭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老人。整理出版他们的著作，

也就是保存文献，文史馆的责任就是存史资政，历史是根据所存文献编写的书。这部丛书的重要性，也就不用我再多说了。

编辑诸君为这部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谢谢大家。

最后，还得再次感谢赵克志同志对我省文化事业的关怀，没有他，这部丛书至少现在还出不来。

二〇一三年十月

# 序

张祥光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王燕玉是我省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凡是研究地方史的学人都不断提到他，怀念他。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文化老人丛书》收入的《紫巢文存》，集燕玉师已出版的《中国文献学综说》《贵州史专题考》等专著和未出版的《贵州省志书浏览记辩》《治书管窥录》多部遗稿共十二种，并选录诗二百馀首，古体文章四篇；另有一附录，收燕玉师自撰自述二篇，子女所撰文章二篇，学生所撰文章三篇及主要著作目录，可知其生平及其学术研究概况。全书约一百五十万余字，分三册出版。

《紫巢文存》第一册中《中国文献学综说》《中国历史要籍介论》两部专著和第二册《中国历代官制分类考表》《中国书法家传论》《中国绘画家传论》及《陶渊明诗考论》四种遗稿，均为有关中国历史文化著述。其中《中国文献学综说》一书最早由贵州师范大学内部出版，一九九七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至今也已十八个年头。那时我国学界开始了探讨如何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这一探讨刚开始，燕玉师就出版了他多年研究我国古代文献的专著，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我阅读该书后，即写有一段话，现转录如下：

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掀起了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热潮，这一讨论，有助于我国古代文化知识的普及。紧跟学术界的讨论，许多高校把传授古代文化知识，分列出若干课程开设，向学生较深较细地讲授传统文化，文献学就是其中一门。因此燕玉师《中国文献学综说》的公开出版，无论是向一般读者普及古代文化知识，或是作为高校开设文献学课程的教材，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燕玉师长期致力于文献、方志之学，功力深厚，故书中采辑、征引的材料相当丰富。该书除按传统文献学体例，对目录、版本、校讎三方面的源流演变，以及对主要人物和重要著述有全面叙述外（这种叙述亦不同他书），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知识，作了较详细的阐明。内容详实，各部分都搜集充分的材料，论说简明精确，其中不少是作者独到见解，如“简策是写非刻”“书籍当分著作、撰述、抄编三类”“校讎不能包括代替版本、目录”“指事应先于象形”“《中原音韵》并无学术价值”等等，俱是一家之言。该书逻辑周密，全书第一章论述文献学的定义与范围界线，笼罩全书；中间两章具体分述文献所包内容；最后三章分说文献学的基础、提高和分工，由浅及深。各章组织介绍各项专门知识，都从古到今，各具系统，如“简策”即简策小史，“训诂学”即训诂学小史，“注释”即注释小史，而其间的衔接都贯串着文献与文献学。

燕玉师著作、论文，其行文言简意深，“他人数言不能了者，只用一二语了之”（借用赵翼语）。该书在遣词造句、编写格式上都是很下功夫的。综观该书，文字简洁，尽量删除可要可不要的词句；力求少用标号，避免排列成挂帐式的条文；引用材料或在句前直书何人何书，或在文末括注何人何典，不取另注方式。该书既可作高校文科文献学专业课的教材，也可作有志于研究中国古代学术的学人重要参考书。

《中国历史要籍介论》是燕玉师在担任中国历史文选课时所撰教材《中国历史文选》的基础上经过三次修编，于一九七七年九月完成并在一九九〇年再次修订，由贵州师范大学内部印刷出版。该书分二部分，上卷叙先秦与秦典籍，下卷叙两汉至清典籍，介论历史要籍七十八部，并对作者进行详细介绍和评论，有的作者简介可视为一篇人物传论。该书不同于其他同类书籍之处，一是撰写《经释》《子释》《史释》三篇文章于先秦要籍之前，以便读者顺序而读；二是对所选要籍的评价有自己的见解与他人不同，如对《宋书》评介甚高，认为是优秀作品；三是主张对要籍通读后再下评论，故书名“介论”是也。另，第二册收入的《中国历代官制分类考表》，是对中国历代各种职官如三公三孤、执政（通称宰相）、主军（指最高专门军事机构）、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领兵、地方官及封爵、功臣号、官品级等按朝代进行梳理、考证、说明的一部考据著述，是燕玉师讲授历史文选课时编制的辅助教材，不但有利于学生阅读历史文献，也可成

为其他文史、文化工作者参考和研究的工具。《中国书法家传论》《中国绘画家传论》，是一个历史学家对中国传统书画名家的评述，作者从历史学的角度，对秦至清历代六十六位书法家，四十一位篆刻家和八十九位画家进行简要的评介，可为研究中国传统书法绘画艺术史研究者参考。《陶渊明诗考论》为未刊稿，是燕玉师遗著中唯一的人物专论，撰写于一九四九年，用近五万馀字的篇幅，从身世、时代、环境、内容、文采、思想、源流等方面，对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陶渊明进行专题研究，其中有许多作者的独特见解，可视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诗歌史一部重要著作。

《贵州史专题考》是燕玉师研究贵州历史的力著之一，现收入《紫巢文存》第二册，除此，在第三册中其他内容著述除《治书管窥录》（其中也有关于贵州史籍的）外皆为燕玉师研究贵州史志地理人物的著述。

对于贵州古代历史的研究，新中国建立后，虽有不少学者均有所涉及，但是所研究发表的文章零散、不系统。而有系统、全面的研究，燕玉师为第一人。一九八〇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贵州史专题考》（简称《专题考》）一书后，很快告罄。一九八四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对该书又增订再版，增加论文十篇。《专题考》涉及面广，搜集有关贵州史料十分丰富，对贵州古代历史上不少重大事件进行考辩，如《殷周鬼方辨》《牂柯沿革考》《夜郎沿革考》等，都是贵州学者所感兴趣和研究的问题。由于该书收集史料系统丰富，梳理清楚，举证有力，很受贵州史学界的重视，成为研究贵州地方史重要的参考书。

该书所登载的考辨文章，有自己的见解。如对西汉牂牁十七县地理位置的考辨，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在一九八三年为当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三）写有一专文《汉牂牁郡地理考释》，文中方先生考证“鳛”（简写为鳛）不包括今遵义地域，他说：“按《汉志》载，延江水流经鳛县，则其县在今乌江沿岸，当可确定，而乌江源流发给二千三百馀里，县境所在当以支流交会为断。汉、晋时期记录，流入延江之水有三：汉水即今三岔河，鳛水今渭河，温水即今鼓楼河，说详《水道考》。此三水并在黔西县境，流入乌江，则古鳛县应在今大方县及黔西县，其在乌江以南之纳雍、织金可能属鳛县，惟其东境鳛水于其县之东入延，则不能包有遵义之地。据记录反复考、校，释鳛

县在遵义府实不可解。”鳛县“不包括遵义之地”，这是方先生的结论。燕玉师在《西汉牂柯郡十七县今地辨》中则认为《汉志》载“鳛，不狼山，鳛水所出，东入延”，“不狼山为今大娄山，鳛水为今正安至绥阳的芙蓉江，东入延的延水为今乌江，鳛县治在今遵义县，县辖境内今西抵仁怀、北包桐梓、东尽务川、南界乌江。”鳛县治“在今遵义县”，这是燕玉师的见解。贵州史学界对“鳛”县地理位置的观点，采用“王”说，未取“方”说。又如且兰，方国瑜先生说“汪士铎《汉书释地略》以为且兰在贵筑，瑜以为此说可取。盖且兰与夜郎接壤，夜郎在安顺地区，而且兰在贵阳地区，而且兰地不必过大，故释且兰在沅、无二水上源之都匀、贵定、黄平以外，包有贵筑、龙里等县。”可见方国瑜先生认为且兰在“贵阳地区”。燕玉师则认为对“且兰”的地理位置考查，要緊扣《汉书·地理志》（简称《汉志》）。《汉志》谓“沅水所出，无水首受”。他说：

“按沅水源在都匀，上游最多只能算龙头江流域；无水源在福泉，上游最多只能算重安江流域，以凯里、黄平靠东与武陵郡分界，则刚好合式，故应除去施秉、余庆、镇远、石阡、丹寨等县，西北方将开阳划入与夜郎县分界，即汉且兰县当今福泉、黄平、瓮安、开阳、贵定、龙里、都匀北半部，麻江至凯里地。”燕玉师不同意方先生且兰在“贵阳地区”说。我们认为，燕玉师之说更有力证。《专题考》一书中有《辨王昌龄谪龙标尉的地域》一文，对唐王昌龄被贬之地进行详细考辨。王昌龄所贬之龙标地域今指何处？长期以来就有湖南、贵州两说。当前各地都有一种倾向，凡是名人，都尽可能往自己的家乡拉点关系，以扩大宣传。从明嘉靖罗洪先《广舆图记》到清乾隆《开泰县志》，以及后来道光、光绪年间先后编修的《黎平府志》，均记载黎平府龙里溪蛮夷长官司即为唐龙标地；同时《开泰县志》《黎平府志》记载，王昌龄墓在黎平“隆里所”。对此，燕玉师引用数十条历史资料进行了辩驳，最后作出结论：“唐代王昌龄谪龙标县尉的地域，不是梁代龙标县所在，今地应在湖南的黔阳、怀化间，不在贵州黎平西北，故明、清以来有关方志所载黎平县的种种王昌龄遗迹，都是由传说追慕而虚构的，不可据信。现今实事求是地说，从地方史的角度纪念流寓诗人王昌龄，当归湖南省考虑，贵州省不宜掠美。”贵州学者，不要无根据的掠美，这就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学人，对后辈树立的榜样。

燕玉师同时期辑录和撰写的《通鉴黔事辑证》（分《资治通鉴》辑证、《续

《资治通鉴》辑证两部分)、《方志综论稿》(分修志形势、名义、性质体制、特征、源流、种类、理论建设、功用、编纂要则、资料、志文十一篇)两书,为参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新方志编纂和贵州历史研究的全省史志工作者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和引导,使贵州新方志的编纂及历史研究工作少走弯路,尤其是《通鉴黔事辑证》一书,不只是资料的辑录,作者还对辑录的通鉴、续通鉴两大文献中有关贵州史料四百八十九条进行详尽的考正和纠误,以给史志工作者“备稽查,供采择”。其考证,正如作者所言,原则是:只要触及贵州境的疆域,力求确切具体,次为字、词、句的衍逸窜讹,厘正方求简明,其无可发掘引申的,即不勉强罗致,仅存原文。这充分说明作者治学的严谨和对读者的负责。

《贵州省志书浏览记辨》书稿,是燕玉师在研读五十九部贵州地方志书后,发现这些志书中,特别是有关地理、建置沿革部分的错误,着重抄录,并对其错误之处所写出的上千条案语,这些案语,不是心得,是纠错。燕玉师所指出的错误是多方面的。

一、错叙:如《贵州名胜志》谓:“五代安氏谓……”王案曰:“安氏乃作者习惯用语,并不是五代时即有。”此案语可以提醒读者,后来一些史书,如《贵阳府志》,在追述唐宋彝族先民历史时,往往习惯用“安氏”称谓,这是不对的。

二、史实差错:如《贵州名胜志》书中谓:“龙里卫:唐、宋俱为罗甸国地。”王案曰:“此说有误,龙里卫地不在罗甸国境,而且宋无罗甸国”。

三、地理位置错误:如康熙《贵州通志》建置沿革谓:“(贵州)周为靡、莫之属。”王案曰:“此说有误,靡、莫之属应在云南。贵州周应分为楚国南裔,巴国南境,蜀国东南境,鳛国、牂牁国北部。战国时除楚地未变,北境北缩外,为大夜郎国地。”

四、交待不全:康熙《贵州通志》谓:“(贵州)蜀汉为牂牁、兴古二郡。”王案曰:“此说不完全,应为牂牁、兴古、朱提、江阳、涪陵、武陵六郡地。”

五、志书编纂者擅改:潘文芮《贵州志稿》一书谓:“天顺元年大坝三(原作“山”,编校作“三”)都掌蛮叛。”王案曰:“此句应是大坝山之都掌蛮叛,校者断句误,此‘山’连都,故错改为‘三’,不知大坝山系地名,都掌系族名,

当时还没有三都之地名。”

六、年代朝代记录错误：《贵定县志稿》载：“汉建元六年置牂牁郡，领县十七，且兰、毋敛属焉。”王案曰：“此处年代有误，应是元光五年置且兰县，元鼎六年置牂牁郡。”

总之，这些错误的纠正，对后人阅读这些志书有很大帮助，起码在引用时可以作一定的参考。

而《治书管窥录》书稿，则是燕玉师傅涉群书时之笔记，分十大类共二百二十三条。正如其自序所言：“对他人说解，既不苟同，亦不故异，多求理得心安，随手记之。”对学界，“或非无裨益焉。”

细读此笔记式书稿，学术价值很大，显示了他做学问的细心，显示了他文献考证功夫的扎实和阅读的宽广。燕玉师在阅览了上百部书籍后，写出了学术性很强的篇章。当前《论语》热大兴，而在二三十年前，燕玉师就对《论语》有精辟的见解。他写到：“《论语》一书既非一时，又非一手，约经五六十年，成于战国之初，篇章松散集合，各章之称谓或神貌亦殊，通体浅显，并无艰奥晦涩，而语言精粹，用意深远，风格迂徐含蓄，雍容和顺，耐人寻味，甚是体现孔门修养。”

刘义庆《世说新语》一书，不少学者都把它作为“小说集”看待，而燕玉师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本书所记虽属历史人物，取材写法都与史传别异，不系军政大故，专重生活细节，故其体裁就史学言，开启野史、杂录之端，而有相对之暴露认识意义，于考史论史不无助益。”他是把《世说新语》作为“野史”一类之书来读的。

对于贵州简称“黔”，他在《“黔”字所系的望沿革》结语一条中说：“直接系于今贵州省地域之名称总共有十六，即战国楚国之黔中地，战国秦国及秦代之黔中郡，汉代之黔水，北周之黔州，隋代之黔州黔安郡，唐代之黔州、黔中郡、黔州都督府、黔中道，宋代之黔南路、黔江，清代之黔西府、黔西州，民国之黔中道、黔西道、黔东道、黔西县。此皆今贵州省，代称黔中或黔南之来源根据。”这就向读者较全面地介绍了“黔”之知识。

不少读者对文献古籍中称“篇”“卷”区分问题不甚明白，燕玉师在《文献记录之形质》一条中，关于古代“篇”“卷”问题写到：“予认为简片太少不能

裹，至少得二十片左右，简片太多裹开携带困难，恐不得超过百片；一篇文章不短不长，写简三五十片恰能编为一卷。篇、卷相等自然理想，但无法皆如此。或短文篇小于卷，或长文篇须多卷，故若干简策汇成一书，计算著录单位，往往称篇称卷不一，可识篇乃书之内容区别，卷乃书之外形分别。”

燕玉师书法、诗词造谐很深，他对历代诗人（有《中国名家历代诗词选》未刊稿）、书画家（见本书第二册《中国书法家传论》《中国绘画家传论》）都有精当评述，故这类笔记条文同样值得学人重视。

《紫巢文存》之出版，对繁荣我省学术，特别是推动贵州地域文化的深入研究有直接助益，应说这是一部嘉惠学林的重要“文存”。

二〇一五年四月

# 紫巢文存 总目

## 第一册

总序 顾 久

序 张祥光

中国文献学综说

中国历史要籍介论

## 第二册

中国历代官制分类考表

中国书法家传论

中国绘画家传论

陶渊明诗考论

贵州史专题考

## 第三册

通鉴黔事辑证

贵州明清文学家

贵州省志书浏览记辨

治书管窥录

方志综论稿

诗文选录

## 附录

后记

# 紫巢文存 一

## 目录

总序 顾 久

序 张祥光

001 中国文献学综说

263 中国历史要籍介论

# 中国文献学综说

# 序

《中国文献学综说》，为贵州师范大学王燕玉教授在讲授《文献学》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经过修订润色而成。得知贵州人民出版社将出版此书，燕玉师嘱咐写一小序，师命难违，欣然允诺。

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掀起了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热潮，这一讨论，有助于我国古代文化知识的普及。紧跟学术界的讨论，许多高校把传授古代文化知识，分列出若干课程开设，向学生较深较细地讲授传统文化，《文献学》就是其中一门。因此燕玉师的《中国文献学综说》的公开出版，无论是向一般读者普及古代文化知识，或是作为高校开设《文献学》课程的教材，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燕玉师长期致力于文献、方志之学，功力深厚，故书中采辑、征引的材料相当丰富。全书除按传统《文献学》体例，对目录、版本、校讎三方面的源流演变，以及主要人物和重要著述有全面叙述外（这种叙述亦不同他书），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知识，作了较详细的阐明。

本书内容详实，各部分都搜据充分的材料。说明确的道理，其中较多著者独到见解，如“简策是写非刻”“书籍当分著作、撰述、抄编三类”“校讎不能包括代替版本、目录”“指事应先于象形”“《中原音韵》并无学术价值”等等，俱是一家之言。

本书逻辑周密，全书第一章论述文献和文献学的定义与范围界线，笼罩全书；中间两章具体分述文献所包内容；最后三章分说文献学的基础、提高和分工，由浅及深。各章组织，介说各项专门知识，都从古到今，各具系统，如“简策”即简策小史，“训诂学”即训诂学小史，“注释”即注释小史，而其间的衔

接都贯串着文献与文献学。

燕玉师著作、论文，其行文言简意深，“他人数言不能了者，只用一二语了之”（赵翼语）。该书稿在遣词造句、编写格式上都是很下功夫的。综观该书，文字简洁，尽量删除可要可不要的词句；力求少用标号，避免排列成挂帐式的条文；引用材料或在句前直书何人何书，或在句末括注何人何典，不取另注方式。

本书既可作高校文科文献学专业课的教材，也可作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引导奠基石。

我们期待燕玉师的其他书稿也能一一正式出版。

谨此为序。

张祥光 朱健华

一九九六年六月